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卡尔·曼海姆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 卡尔·曼海姆 著

黎 鸣 李书崇 译

周纪荣 周 琪 校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167-4

I. 意… II. ①曼…②黎…③李… III. ①意识形态  
②乌托邦 IV. B200.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213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卡尔·曼海姆 著

黎 鸣 李书崇 译

周纪荣 周 琪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167-4

---

2009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38.00 元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

A HARVEST BOO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 New York, 1936

根据哈考特—布雷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纽约 1936 年版译出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 前 言

本书汇集了曼海姆教授的各类著述。第二至第四部分是其所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第五部分是其最初发表在阿尔弗雷德·菲尔坎特所编著的《社会学袖珍字典》(F. 科恩出版社, 波恩, 1929, 现为舒尔特-布尔姆克出版社,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1931)中的“知识社会学”词条。第一部分是特地为英语读者所写的介绍本书的文章。

第二至第四部分论述了知识社会学领域的中心问题,并举例说明了这一被应用于近代和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的新兴学科,最后一部分则试图系统地对这一新科学所关注问题作一概述。

读者将发现本书的前四部分与最后一部分在风格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相当详尽地阐述了其各自的主题,而后者由于最初是为百科全书所写的一篇文章,因而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概论。

本书最后附有分类参考书目,包括曼海姆教授在上述文章中所引的所有论著。此外,还加上了一些译者认为与本论题相关的和有启发性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思想界的更重要的代表作。

译者认为英文译文应尽可能地忠实于德文原文。虽然为了文字流畅起见,某些改动有时是必要的,但译者尽了极大的努力来精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



在此特别对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库利·安吉尔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阿瑟·伯格霍尔兹先生表示感谢,他们分别审阅了本书的第二、第五部分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第一至第九部分。同时诚挚地感谢 E. 金斯伯格女士和琼·麦克唐纳小姐,她们对译文的编辑提供了帮助和有价值的建议。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也为打印译文手稿提供了慷慨的帮助。

路易斯·沃思

爱德华·A. 希尔斯





# 序 言

路易斯·沃思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最初的德文版本是在激烈的思想论争气氛中出现的，当时一些思想家为寻求解决所提出问题的可靠的和站得住脚的方法展开了广泛的论争，这场论争最后只是由于那些思想家的流亡或被迫沉默而平息。从那时起，导致自由魏玛共和国垮台的思想冲突在各国不断出现，特别是西欧国家和美国。曾经被认为仅仅是德国著作家们偏重的思想问题，实际上已蔓延到全世界。过去曾被看作是个别国家少数知识分子关注的深奥问题，已成了现代人的共同困惑。

与这种局面相呼应，出现了一大批描写西方文明的“终结”、“衰落”、“危机”、“衰败”或“死亡”的作品。尽管这些标题传达了某种警示，但是在大多数这类作品中无法找到对于造成我们的社会混乱和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和发生过程的分析。与这些作品相反，曼海姆教授的著作对我们时代的社会潮流和局势从思想上、信仰上和行为上作了清醒的、批判性的学术分析。

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根据现代的思想和考察，过去曾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



被人们宣布为需要得到论证和证明。而证明的标准本身已成为争论的主题。我们看到人们不仅普遍怀疑观点的有效性,而且怀疑那些表明这些观点的人的动机。这种状况由于在思想领域中每一个人反对所有人的论战而恶化,因为在这一领域人们渴望得到个人声誉而不是真理。曾经被认为是无偏见地和客观地追求真理的净土的思想领域,现在弥漫着生活的世俗化、社会对抗的尖锐化和对个人竞争精神的强调。

无论这些变化从表面上看如何纷乱不宁,它们也有其有益的影响。在这些变化中,可以提及的是迄今最彻底的自我审视的趋势和更全面地认识的观点与其产生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趋势。虽然说动摇我们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的一场大动荡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像是一个严酷的幽默,但必须承认,社会科学所遭遇的变化和混乱的景象同时为富有成果的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然而,这一新发展建立在对困扰着社会思想的种种障碍的充分认识之上。这并不意味着自我澄清是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唯一条件,正如下文将显示的那样,它不过是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1. 当前社会知识的发展由于两个基本因素的影响,即使还没有瘫痪,但也受到了阻碍,一个来自外界,另一个则在科学界本身之内起作用。一方面,过去一直阻碍和延缓社会知识发展的力量仍然不足以说明社会知识的发展与它们看作是自己兴趣的东西不相称的产物;另一方面,人们试图把自然科学的传统与整套研究方法搬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尝试常常导致混乱、误解和毫无成效。关于社会问题的科学思想至今已经发动了主要针对学术上不容异己



和制度化的压制的斗争。这一科学思想一直在为确立自身而反对其永恒的敌人：教会、国家和宗族的权威利益。然而，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中，反对那些外部力量的斗争至少已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了容忍不受限制的研究、甚至鼓励自由思想的风气。在中世纪的精神黑暗时期和现代世俗专制的兴起时期之间的短暂间隙中，西方世界许诺将实现一切时代有启发性的思想家的理想，即通过充分地运用智慧，人类可以战胜自然逆境和文化堕落。然而，正如在历史上屡次发生的那样，现在这一理想似乎又在经历磨难。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堂而皇之地和自豪地委身于非理性的狂热，甚至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和理性的避难所的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最近也再度出现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

学进步以维持现存秩序所致。

自然科学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条的胜利同对社会生活研究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经验过程已深深地侵入了古代人有关自然的教条,而古典的社会学说却表明,在世俗精神和经验精神的攻击下却较难以渗透。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古代人关于社会事务的知识和对其所作的理论化远远胜于他们的物理学和生物学见解。其时证明新的自然科学的实际效用的时机尚未到来,而现存的社会学说则又还不能被令人信服地证明是无效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被后世奉为权威,但他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见解却越来越被看作是古代迷信的糟粕。

18 世纪初以前,政治和社会理论一直受到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详细阐述的思想范畴的支配,而且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在神学的框架内运作。社会科学中曾具有实效的那部分主要是关心管理事务。代表这一潮流的财政学和政治算术把自己局限于日常事务,很少涉及理论。结果,有关最受争议的问题的那部分社会知识几乎没有实用价值,而这却是经过一定发展阶段的自然科学已经获得的。作为社会科学发展唯一源泉的社会思想家,也不可能期望教会或国家提供支持,而更加正统的派别却能从它们那里得到财政和道德支持。社会和政治理论越是世俗化,它对使现存政治秩序合法化的神圣化了的的神话的消除越是彻底,新兴社会科学的地位就越是不稳固。

当代日本在社会知识和技术知识方面所作的不同努力和对待两者态度的差别为我们提供了引人注目的例证。日本一旦对西方



的影响潮流开放门户，它便热切地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和方法，但是甚至直到如今，日本对于外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仍旧疑虑重重，并顽强地加以抵制。

日本对物理学和生物学成果的热情接受与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谨慎和防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大部分被日本归为“危险的思想”。当局把关于民主、宪政、皇权、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课题的讨论看作是危险的，因为关于这些论题的知识可能动摇被神圣化了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

但是不要以为这种情况是日本所独有的，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许多在日本被标为“危险思想的”论题直到最近也是西方社会的禁忌。甚至在今日，对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和信仰进行公开的、坦



社会领域的“事实”的论断都触及某一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人们对注意某些事实的存在的要求，不能不引起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理由就依赖于对“实际”情况作不同的解释。

2. 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传统上称为科学的客观性问题。用英美世界的说法来说，客观意味着在事实面前公正、无偏好、偏爱或偏见、无倾向性、无预先设定的价值或判断。这种观点是对旧的自然法概念的表述，根据自然法，对自然现状的思考，会自动地得出这些法则，而不会染上思考者的行为准则的色彩<sup>①</sup>。在研究客观性问题的自然法方法消沉之后，观察事实本身的不带个人色彩的方法又一度通过实证主义的流行而重新获得支持。19世纪的社会科学充满了对情感、政治利益、民族主义和阶级感情的歪曲的警示，也充满了对自我净化的呼吁。

的确，现代哲学和科学史如果不是牵强附会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走向这种客观性类型的趋势。人们假定，它包含了通过从否定的角度来消除带偏见的看法和不完善的推理，并从肯定的角度来阐述批判性的带自我意识的观点，研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合理方法，来寻求有效的知识。乍看起来，其他国家的思想家在关于科学的逻辑和方法论方面的写作好像一直多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但如果留意一下英语国家中的一长串思想家的名单就会纠正这一看法，那些思想家一直在侧重于同样一些问题，只是没

---

<sup>①</sup> 这一思潮以后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并且构成了本书的主题。我们正是从它获得了下述洞见：政治—伦理规范不仅不能产生于对事实的直接思考，而且它们本身还对理解事实的方法形成了影响。参见索尔斯坦·维布伦、约翰·杜威、奥托·鲍尔和莫里斯·哈尔布瓦克斯等人的著作。



有把它们特别标为方法论问题而已。在寻求有效的知识时对问题和陷阱的关心,肯定构成了那一长串才华横溢的思想家著作的不容忽视的部分,这些思想家包括从洛克、休谟、边沁、米尔、斯宾塞到我们时代的作者。我们并不总能认识到这种对待认知过程的方法是阐述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逻辑学和心理学前提的认真尝试,因为它们没有带有明确的标记,而且人们也没有有意这样做。然而,只要科学活动是以有组织的和自我意识的方式进行的,这些问题就总是受到相当大的重视。事实上,在诸如 J. S. 米尔的《逻辑体系》和赫伯特·斯宾塞出色的、但却被广泛忽视的《社会学研究》等著作中,作者都直接而全面地论述了客观社会知识的问题。在斯宾塞之后的时期,由于统计技术占优势地位,其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G. 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人们对社会知识客观性的兴趣有所偏离,但是在当代,格雷厄姆·沃拉斯和约翰·A. 霍布森及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又标志着向这一兴趣的回复。

尽管美国知识界呈现出我们在欧洲人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的贫乏景象,但它还是产生了许多关注社会知识客观性的思想家。在这方面不同凡响的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著作。虽然他是有些迂回地通过分析社会习俗和惯例对社会规范的影响,而不是直接通过对认识论的批判来研究这一问题,但由于他把注意力放在种族中心主义对知识的扭曲作用上,他便通过这一有效的方式,把知识客观性的问题放到了一个独特的具体的社会学环境中。不幸的是,他的弟子们未能对其方法的丰富潜力作进一步的探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兴趣放到了详细阐述其思想的其他方面。与萨姆纳的研究方法有些类似的是索尔斯坦·维布伦,他在其一系

出色而深刻的文章中,探讨了文化价值同知识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詹姆士·哈维·鲁宾逊的著作《心智的形成》,沿着现实主义路线对同一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触及了本书所详细分析的许多问题。更近一些,查尔斯·A. 比尔德教授的著作《社会科学的性质》从教学的角度分析了客观社会知识的可能性,该书显示出曼海姆教授著作的影响痕迹。

虽然强调文化价值和兴趣对知识的歪曲影响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从文化角度来评论知识的消极方面已达到了一个接合点,至此,必须承认思想中评价因素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意义。如果说早期关于知识客观性的讨论强调要消除个人和集团的倾向性,那么更现代的方法则要求人们重视这一倾向性在认识论方面的积极意义。前者对客观倾向的探求,假定“客体”与“主体”业已分开,后者则看到了客体同感知主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最新的观点认为,在经验过程中,当主体的兴趣集中在世界的某一特殊方面时,客体就显示给了主体。这样,客观性就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在客观性中,客体和主体是相互分离的两个实体;另一方面,在客观性中,两者的相互作用又很重要。从第一个意义上讲,客观性是指我们掌握数据的可靠性和我们得出结论的有效性;从第二个意义上讲,客观性关系到同我们兴趣的相关性。尤其是在社会领域,真理不仅是思想和存在之间的简单一致,而且是带有调查者对其调查对象的兴趣、他的观点和评价的色彩,简言之,带有对其关注对象的界定的色彩。然而,这种客观性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真理与谬误之间因此没有明确的界限。它并不意味着人们随意想象的看法、态度和观点,或者他们想要其他人相信的东西都与





事实相符。即使是在这种客观性的概念下,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不仅人们认识不足和自身的错误知识可能造成对事实的歪曲,而且在某种环境下人们没有能力或不愿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也可能造成这种歪曲。

构成曼海姆教授著作基础的客观性问题的概念,对于那些熟悉以詹姆士、皮尔斯、米德和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哲学潮流的人来说,一定不会感到十分陌生。虽然曼海姆教授的研究方法源自一个不同的知识遗产,康德、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在这一遗产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他关于许多关键问题的结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是一致的。然而,这种趋同只限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范围内。在美国社会学家中,已故的查尔斯·H.库利和R. M.麦基弗曾明确地表达过这种观点,W. I.托马斯和罗伯特·E.潘克曾含蓄地表达过。我们之所以不把这些作者的著作同本书中的问题联系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知识社会学系统明确地探讨的问题,只是在社会心理学特殊学科的框架中偶然被论及,或者只是经验研究中一个尚未开发的副产品。

探求客观性,给在社会生活研究方面建立强有力的科学方法的尝试带来了独特的困难问题。在研究物质世界的客体时,科学家们可能很容易把自己局限于外部世界显示出来的一致性和规律性,而不去探究现象的内部含义,而在生活领域,所做的研究主要就是理解这些内部含义和联系。

可能确实有一些社会现象,也许所有社会事件的某些方面,都可以像一些物体一样从外部来加以观察。但不能由此推论说,只有那些在物体上找到表达的社会生活表象才是真实的。如果把社

